

汪 鹏 事 辑

周 迅

在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各种层次的交往中，频率最高，人数最多，也即构成了这一交往的主体和基石的，是双方的民间往来。正是不计其数的“民间使者”，不惧路途之遥，不畏风涛之险，开拓了并经常地维系着两国之间的海上通道，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而有效地传递着信息。但是，在史籍上，这些“民间使者”的功绩，大半已被抽象成概况的描述和枯燥的数字。作为个人，他们很少留下姓名和事迹。我们绝难从史书上看到他们的具体活动方式，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。此外，在漫长悠久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，有幸标名青史者，绝大多数是功在向日本传播中国文化。反之，能以确凿的见闻向中国人介绍日本情况的，几如凤毛麟角。这当然和当时两国之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距有关，也和我国统治阶层、文化阶层封闭自守的心态有关。但从今天看来，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遗憾。

汪鹏生活于十八世纪中叶，正是这无数“民间使者”中的普通一员。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虽然谈不到功彪日月，却自有他的特色。汪鹏之为人所知，主要有两件事：一件事，是他曾受藏书家鲍廷博的委托，在日本访求汉学书籍，带回中国；另一件事，就是他著有《袖海编》，记述他在长崎的所见所闻，都受到当时学术界的注意和欢迎。

汪鹏在日本访书的成果，现在知道的，有在中国早已失传的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和梁代皇侃的《论语义疏》，以及日本学者

据日本所藏珍籍校订中国经书的成果——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。前两种由鲍氏呈献给四库馆，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（《四库全书》中的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另有来源，非汪鹏所携归者），又被鲍廷博刻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中。汪鹏的名字也就随之留在了这两种著名的丛书中。

鲍廷博曾为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作跋云：“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一册，吾友汪君翼沧市易日本得之携归，举以相赠。”鲍氏因读《宋史》，知道宋代曾有日本僧人裔然献郑注《孝经》一册，而后来的诸家簿录均不见著录，想到日本国中可能还有存留，“因瞩汪君访之，不意其所得者更为裔然之未献也。……汪君所至为长崎澳，距其东都尚三千余里，此书购访数年，得之甚艰，其功不可没云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提要亦说明：“据卷末乾隆丙申（乾隆四十一年）歙县鲍廷博新刊跋称，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，得于彼国之长崎澳。”此外，同时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卢文弨、翟灏、吴騫等人，也多曾在文字中叙述他们见到书时的欣喜心情和读后的心得，并兼记及汪鹏其人。

乾隆四十一年，吴騫和卢文弨为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作序。吴序说：“《古文孝经孔安国传》世久失其传，武林汪君翼沧随估舶至日本，访求以归，吾友鲍君以文得之甚喜，遂刻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……。”卢序说：“《孝经》有古今文，郑康成注者今文也，孔安国传者古文也，五代之际，二家并亡。宋雍熙中尚得今文郑氏注于日本矣，今又不传。新安鲍君以文，笃学好古，意彼国之尚有是书也，属以市易往者访求之，顾郑氏不可得，而所得者乃古文孔氏传，遂携以入中国。此书亡逸殆及千年，而一旦复得之，此非天下学士所同声称快者哉！……”。

乾隆五十三年，卢文弨为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《论语义疏》

作序说：“……向见钱遵王所记《论语》异文，云传自高丽，其本世亦罕见。吾乡汪翼沧氏常往来瀛海间，得梁皇侃《论语义疏》十卷于日本足利学中，其正文与高丽本大略相同。彼国亦知中夏之失传矣，其扶微举坠之意恳恳，欲大其传，而不为一邦之私秘，此其所见诚卓而其意诚公，夫孰得而小之也哉！……夫是书入中国之首功则汪君也……”。

翟灏在他的《四书考异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愚于乾隆辛巳（乾隆二十六年）从堇浦杭先生（杭世骏，字堇浦）向小粉场汪氏（藏书家汪启淑）借阅此书（指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），知彼国尚有皇侃《义疏》，语于杭。杭初不深信，反复谛观，乃相与东望叹息。逡巡十年，众友互相传说。武林汪君鹏航海至日本国，竟购得以归，上遗书局。长塘鲍君廷博槧其副于《知不足斋丛书》中，以初模一本见馈，不啻获珍珠船也。……彼国《义疏》原云有二本，且皆未刊刻。汪君所购，将其后刻之校定本欤？”。

（见《四书考异》卷三十二：前人考异本）

吴騫在对汪鹏带回的《论语义疏》进行研究以后，于乾隆四十六年，写成《皇氏论语义疏参订》十卷，其序曰：“梁皇侃《义疏》十卷，见于隋唐各志及陆元朗经典序录，盖唐世尤重之。自宋邢昺等为正义后，遂隐而弗彰，迄今数百年，几疑已绝于世。前岁武林汪君航海至日本，得其本以归。予友鲍君以文亟为开梓，以广其传。数百年湮晦之书，一旦可使家学而人习之，谓非治经者一大幸与！既汪君复从日本得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一书，疑即服元乔义疏叙中所称神君彝与根伯修在足利学同校讎之本也。予观其中《论语》，知彼国皇疏亦有数本，向汪君所获者，将其新锲之定本与？汪君名鹏，字翼沧，钱塘人，所著有《袖海编》。”（见《愚谷文存》卷一）

从这些序跋，可以大概了解汪鹏当时得书的经历。这几种书，既是国内早已不可得见的珍奇古本，又都经过日本学者的整

理校订，重行刊刻，并附有日本学者的序跋，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经学的新成果。在经学和考据、校雠之学盛行的乾隆中叶，它们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，并且引起了中国学者进一步了解日本学术文化的兴趣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汪鹏既留心于书事，可以推想，他从日本带回的书籍当不止这几部。例如，当时的另一学者梁玉绳还看到过汪鹏带回的日本墨谱：“同里汪翼沧鹏三至日本，携归其国松井氏《墨谱》一帙，所造墨数百品，佛足碑墨为最，余于汪处见之，小楷图式皆绝精。汪云有王衍墨，长寸余，阔八分，两头如圭，凡误书文字，不加刀水，直以墨就误处磨之，一埽无痕，惜购不可得。”

（见梁玉绳《清白士集》卷二十四）松井氏是日本的制墨世家，历代任和泉椽，司造御墨。传到松井元泰（1689～1743），以为本国制墨的方法不精，设法从中国获得墨法二品，依法试制，又亲自到长崎，和中国的文人、商贾结交，探讨制墨的蕴奥，经过刻苦努力，一变旧制。日本正德二年（1712），元泰将自己的作品编成《古梅园墨谱》，就是梁氏在汪鹏处所见到的。它本身就是两国制墨工艺交流的一个结晶。汪鹏也曾在所著《袖海编》中介绍说：“日本贡墨最佳。其官工为古梅园和泉椽，世制贡墨，以南山向阳松枝取烟，用鹿骨胶制成，其质轻而细，其色黑而漆，其式仿古，不下数十百种，有《墨谱》斑斑可考。彼国寻常人亦不易得，即得亦不敢用。”

其后，松井元泰之子松井元汇又辑成《古梅园墨谱后编》，于日本安永二年（1773）刊印，汪鹏为它写了跋文。跋中盛赞松井氏制墨“专心笃好，数世其业，”“不惮烦劳，远涉崎港，虚怀陬访，考古证今，必超无上乘而后已。”《古梅园墨谱后编》北京图书馆藏有两部，其一原为鲍氏知不足斋藏本，考虑到鲍廷博和汪鹏的交往，很有可能也是汪鹏从日本带回来的。其跋作于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不仅是汪鹏不多的传世文字之一，而且

字作行楷，当是据汪鹏的手书刊刻，殊为难得。

汪鹏所著的《袖海编》，是他对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另一贡献。《袖海编》为笔记体，一卷，除小序外共五十条，全文五千字左右。宋代苏轼有《取弹子涡石养石菖蒲》一诗，记述他曾在文登蓬莱阁下海滨拾取石子数百枚。诗中有句曰：“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”，“置之盆盎中，日与山海对”（《苏东坡全集》卷十八），《袖海编》书名即取其意。卷首有序：“东坡云：‘我取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’，真得诗家三昧。余客东瀛，寓居山馆，岩壑在望，云烟满目，而跬步不能出，直有抛南岳卷沧溟之志。是坡所袖者，以石为海；吾所袖者，以海为石。今姑就其所见闻略为记识，名曰《袖海编》。海耶？石耶？不得而知之矣。或云：昔有波斯持宝石入中国，其值千万。吾子他日言归，藉得如波斯之所挟持，岂非快事。然时探蛟室，过屠门，其又斯编之余绪乎！诸同人闻之其毋哂！乾隆甲申重九日竹里漫识于日本长崎唐馆。”（见《昭代丛书》本《袖海编》）乾隆甲申为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，这篇序言，对此作的内容、宗旨、撰写时间和撰写地点都交代得很清楚。

乾隆年间，正值日本锁国期间，对中日贸易多有限制。乾隆二十九年前后，每年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不过十三艘上下^①。中国商人到达日本以后，他们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长崎唐馆之内。“客或有正事出馆，预白于通事，通事请之使院，使院出批帖，定人数，至期监使来，然后得行。”（见《袖海编》）因此，汪鹏的见闻不能不受到局限。但他依然记下了不少有价值的情况。

汪鹏在这里看到的，是一个富庶繁荣的日本。“日本为海东富强之国。长崎孤鸾海外，素称穷岛，然贫窶者绝少。”“长崎一名琼浦，风土甚佳，山辉川媚，人之聪慧灵敏不亚中华。男女无废时旷职，其教颇有方。”“从馆内望，四山逼近，仄径参差，衡宇褰云，田畴人绘，冬树不凋，春烟如织。田或两熟或三

熟，……地丰土沃，而人烟辐辏，商贩丛集。”他具体记述了当地的物产、居民的衣饰、器用、礼仪和生活习俗，也记述了中华文化在当地的影响：“唐山书籍，历年带来颇伙。东人好事者，不惜重价购买，什袭而藏，每至汗牛充栋。然多不解诵读，如商彝汉鼎，徒知矜尚而无适用也。”“国无制举，故不尚文墨。间有一、二束修自爱者，亦颇能读圣贤书，博通经史，学中华所谓韵语古作之类。如和泉王家者，颇知宝贵宋元人妙翰，每向客求得其一二件，珍如珙璧。又有松延年、林海卿、柳德夫，皆渊雅绝俗。外此如《兰京先生集》暨僧《昨非集》，皆哀然成帙。所为诗颇仿唐音，无宋元浇薄气。又平子行号三思，善行草书，殊近香光一路。”其中如松延年，当是日本学者兼诗人松村梅冈（名延年）；《昨非集》是禅僧大典显常的汉诗文集；《兰京先生集》未见于日本古籍目录，或许是高野兰亭的《兰亭先生集》之误。这些人物和作品，都和汪鹏大体上同时，首先将他们的名字介绍给中国的，就是《袖海编》。

《袖海编》以相当长的篇幅记载了长崎唐馆的环境、面积、建筑，以及中国商船到日本后开展贸易的全过程，包括日本管理贸易的机构，各级官吏的名目与执掌，交易的各个具体步骤，如“上办”（以货贮库）、“关验”“清库”（双方一起盘查货库）、“王取”（官方先择取所需的货物）、“插番”（司事人领日本商人开库看货），以至最后“集客列坐，授以批价文簿，评论低昂，随时增减，至有竞而哗者，非一日所能定。则书卖字于货口之上，盖以图记，则交易之事粗毕，专待出货。”它也记述了当时日本各种反天主教的措施，如携带书籍者，必须经圣庙司铎检查，“恐溷天主教邪书故耳。”“唐山船至，例有读告示、踏铜板二事。告示中大略叙天主邪说之非，煽人之巧，恐船中或有夹带而来，丁宁至再。铜板则以铜铸天主像，践履之以示摈也。”这些史实，在日本有关长崎的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，稍

加验核，可以知道汪鹏的记录相当准确。它从一个中国亲历者的角度，对日本的史料作了切实的印证。

由于商船需要等待顺风才能返航，中国客商往往要在长崎逗留数月甚至一年以上《袖海编》还以生动的笔墨描述了中国商人在长崎唐馆的日常生活。虽然出入不太自由，但唐馆之内自成天地，经常有各种名目的宴会，“馆中宴会极繁，交相酬答，有上办下办酒，有通办酒，有饮福酒，有春酒，有宴妓酒，有清库出货酒，寻常醪饮尤多，珍错杂陈，灯明烛灿，殆无虚夕。”附近有祠观寺庙不下二十余处，“皆占胜地，修静绝尘，花木幽深，不闻鸡犬”，每逢神诞、醮事、或名花开放的时候，往往游览竟日。

“唐馆香火有三大寺，曰兴福、崇福、福济，皆唐山僧主之。江浙人则隶兴福，福州则隶崇福，漳泉则隶福济。”一般日本人是不能随意出入唐馆的。“港口中流有山如拳，俗名换心山。货库前有桥，名落魂桥，言唐人经此则心变魂消，挥金如土矣。”为我们留下了一幅幅中国商人在海外生活的风情画，是不见于其他史籍的难得的资料。

《袖海编》中的长崎风情，同样使当时的中国士人倍感新奇。此著稿本最初归于藏书家鲍廷博，同时代人多曾得见。梁玉绳从中摘取了十六条，后来编入自己的文集《清白士集》中，附于第二十四卷之末，题名《日本碎语》。梁为作小序曰：“吾杭汪翼沧，贾于海外，著《日本碎语》一卷，亦云《袖海编》，备记彼国之山川风俗物产，史家作外国传必有取乎此。余尝怱怱鲍君以文刻入《知不足斋丛书》，尚未果，略采数则如左……”充分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。

乾隆五十一年，震泽人杨复吉从鲍廷博处得到《袖海编》，刻入他正在编辑的《昭代丛书续编》中。杨氏在《袖海编》末附跋云：“长崎为日本西南境，距其东都尚三千里，中华市舶咸萃聚其地，而记载阙如。今得是编，海国为不寂寞矣。是编为汪君

手稿，余钞从知不足斋鲍丈以文，盖以文汇刊丛书中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两传疏皆属汪君自彼中购归者。”也指出《袖海编》是当时国内仅见的记载长崎情况的著作。

光绪年间，《袖海编》又被收入王锡祺所辑的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》第十帙。

校此三本，《清白士集》所辑是摘记，不足一千字，行文次序完全不同于另两本，字句也多有不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有些内容和其他两本所没有的。如：“估客所集之地为长崎澳，又名琼浦，犹中国一大都会也，距王城尚三千余里，山水秀丽，烟火万家。”“书籍甚多，间有中国所无之本，……余购得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及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，传之士林焉。”“余三到崎澳，未得一游王都。曾因遭风飘至一处，遥望白石为城，真如蓬莱昆阆，不知何国，恐未必是其都也。”此外，从题名及梁玉绳的小序看，似乎是以《日本碎语》为正式名称，也和其他两本不同。很可能梁氏所见是汪鹏的初稿本，以后又经过作者修改，才定名为《袖海编》。

《昭代丛书续编》本和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》本，文字基本相同，惟小方壶斋本的小序较为简略，只有七十字，显然是从昭代本的小序中摘录的。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》收录各书往往有删节，而昭代本不仅是据稿本所刊，杨复吉还在丛书的例言中声明，其所收各书均“备录原文，一无删窜”，当以此本为最可靠。

此后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曾将小方壶斋本《袖海编》全文译成日文，刊于1940年《东亚论丛》第二辑，题为《乾隆时代一支那人之日本观》。高罗佩为它写了序文，认为此文所记多有未见于其他长崎文献者。但高罗佩的译文比较粗糙，标点断句时有错误，个别地方有错简。

汪鹏虽然由于以上原因见知于当时士林，但关于他的身世，史书的记载极其简略。如前所述，当年和汪鹏有过交往的鲍廷

博、梁玉绳等人，在有关的题跋中曾对汪鹏有所介绍，这些应该是最原始、最可信的资料，可惜的是都只有短短的三言两语。

民国十一年刊民国续修本《光绪杭州府志》卷一百四十三（义行传）有汪鹏传：“汪鹏字翼仓，仁和人，慷慨好施予，朋好中孤寒者助膏火以成其名，亲串有婚嫁不克举者成全之。尝泛海往来浪华岛，购古本《孝经》、皇侃《论语》、《七经孟子考文》，流传中土。后歿于舟中。先是，船舶例不得携棺入中土。十年前有客死者，鹏为岛中人言之，得破格从事。至是不烦请托，竟举丧以归。人谓忠信之报。”注明出自《行略》。同书卷八十七（艺文志）著录有《袖海编》，下署“国朝仁和汪鹏翼苍撰”。

光绪末年，李浚之“选画家诗以代读画”，每人附以小传，编成《清画家诗史》。其丁集下“汪鹏”条，选录《袖海编》中咏妓之诗一首，附小传云：“汪鹏字翼苍，一作翼昌，号竹里山人，钱塘人，以善画客游日本，垂二十年，岁一往还，未尝或辍。喜购古本书籍，归呈四库馆，或付鲍渌饮（鲍廷博）或阮芸台（阮元）传刻行世。有《袖海编》。”这段小传比较具体，但没有说明资料的来源。

盛饘于民国十年辑成《清代画史增编》，卷二十有“汪鹏”条：“汪鹏字翼昌，号竹里山人，画得古人法，工诗，著《袖海编》。”注明引自《两浙名画记》。

将以上各家记载综合起来看，不但语焉不详，而且时有牴牾。如汪鹏字翼沧，“沧”又写作“昌”、“苍”、“仓”；其籍贯或作钱塘，或作仁和，或笼统称为杭人（钱塘、仁和在乾隆年间都是杭州府的属县）。其中和汪鹏过从最密的鲍廷博称之为“吾友汪君翼沧”；曾在汪鹏处看日本墨谱的钱塘人梁玉绳称之为“同里汪翼沧鹏”；据手稿刊印的昭代本《袖海编》亦署为“钱塘汪鹏翼沧著”，则其字应为翼沧，籍贯当以钱塘为是。只

是，以汪鹏之能诗能画能文，必定有家学渊源。当时汪氏亦可称钱塘名族，雍正至乾隆年间，先后有汪沆、汪宪、汪师韩等以学者及藏书家知名于时。其中如振绮堂汪宪父子和知不足斋鲍氏常有往来。而现在见到的有关汪鹏的资料中，却无一言及其家世，或及于钱塘诸汪，这是什么缘故，还有待进一步求索。

汪鹏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，尤其是他的画，在当时有一定的知名度。那么，他是以什么身分到日本去的呢？各家说法也不一致。多数是含糊其词，只说“随估舶至日本”，“航海至日本”。

《清画家诗史》则说他是“以善画客游日本”，高罗佩即据此认定《袖海编》是代表了“中国艺术家”对日本的观察。但若是作为画家客游日本，不可能也不必要“垂二十年，岁一往还”。只有鲍廷博在《古文孝经孔氏传》跋中，明确说汪鹏是“市易日本”，是去经商的。鲍氏曾委托汪鹏在日本访书，他说的自然不会错。只有从事中日贸易的商人，才需要这样经常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。其实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日本方面有很清楚的记载。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研究清代中日交往史有年，他的有关论著就曾提到，在日本的长崎史料中，多有汪鹏作为中国商船的“船主”到达日本的记录^②。“船主”是一艘商船的最高负责人，既主持全船日常事务，也主持和日本贸易及交涉的一切事宜，其商人身分是毋庸置疑的。《袖海编》记商事和商人的生活最为详尽，若非此中人，道来不能如此亲切细致，也是一个佐证。从《杭州府志》的记载，还可以看出汪鹏在当时的海商中享有相当的威望。

汪鹏的生卒时间不详。根据松浦章先生的研究，长崎史料中关于汪鹏作为船主到达日本的记载，现在能见到的一共有八次。最早的一次是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，其后分别是乾隆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五年（1772—1774，1776—1778，1780）^③。《袖海编》乃乾隆二十九年著于

长崎。据《清白士集》所录《袖海编》的佚文看，这是汪鹏第三次到日本。他在中日之间“岁一往还，未尝或辍”，“垂二十年”。从乾隆二十七年算起，到乾隆四十五年，恰是十九年。这样算起来，汪鹏最后“歿于舟中”，很可能就在乾隆四十五年。汪鹏的诗、文、书、画都很有根柢，可见在青少年时期受过系统的教育，其出海为商当在成年之后；去世的时候，他还正在海上奔波，可见还不到耄耋之年，很可能正值四五十岁的盛年。因此，他可能生于雍正年间或乾隆初年。

汪鹏长年奔走于中、日之间，作为一介平民，由于他自身的特殊条件——既是商人，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而且和当时杭州的士人有密切的来往，使他能在锁国的日本和封闭的中国之间，既从物资交换，也沟通文化信息。特别是他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，以独到的观察，向同时代人介绍他所看到的日本，在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中引起了相当的反响，也为后人留下了若干珍贵的史料，实在是极为难得的。垂二十年的经历与见闻，肯定比他记录流传下来的要丰富得多，可惜现有的资料尚不足以清楚地勾画他的一生。除《袖海编》及《古梅园墨谱后编》一跋外，也还没有发现他的其他诗文或绘画。只能将目前搜集所得汇录于此，姑名之曰“事辑”，以备今后进一步的探索。

注：

①木宫泰彦著，胡锡年译：《日华文化交流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，第639—649页《清朝商船的往来》。

②③松浦章：《乾隆时代の长崎来航中国商人》，刊《啞哑》10期，1978年6月。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权儒学）